

京华烟云上

林语堂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京华烟云上

林语堂著 张振玉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京华烟云 JINGHUAYANYUN

林语堂 著
张振玉 译

责任编辑：梅中泉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75印张 5 插页 274,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通化市印刷厂印刷 印数：1—160,0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389·90 定价：2.90元

献给需要巨人呼唤巨人的时代

——《拿来参考丛书》总序

金 钟 鸣

不管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分歧，不管对新时期十年文学有着怎样的褒贬，有一点大概是作家、理论家都能够同意的：我们的文学，已经开始进入了广泛探索、多元选择和自由竞争的时代。单单是对文学的估价不再是一个调子，一种声音，一类模式，而是有着差异，有着分歧，有着对立而又同样受到尊重的各种观点，就标志着封闭时期的结束，开放年代的开始。至少，我们的文学已经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上，坚定而又步履维艰地向着新的创造的时代过渡。在这个特定条件下，我们觉得迫切需要把过去那些曾经粗心忽略、简单否定、盲目批判的世界名著和其它有重要参考价值作品拿来，郑重地向广大作家、理论家、文学青年和一切有志于文化的重建和超越的读者，提供多方位的参照系；也才有现实可能疏浚精神食粮的航路，把这套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奉献给我们这个需要和呼唤文化巨人的时代。

作家、理论家在回首审视自己几十年文化创造足迹的时候，在面向未来雄心勃发而又力不从心的时候，都会痛感长期封闭所造成的种种遗憾、不幸和灾难。

文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一种重要标志，本质上是开放的。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伟大作品，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开放气氛中出现，因而也就成为人类的共同的精神瑰宝。封闭政策，只能导致贫困愚昧，制造文化沙漠，产生山聋而哑、枯涸渺小的“末人”。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开放，就意味着面向世界。一八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歌德以其特有的诗人的敏感，预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如果说，歌德在这里是从普遍人性论的唯心史观出发，二十一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则把它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完全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运用和发展。

作为一种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那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怎样对待人类所

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知识财富，怎样培养新的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列宁也有过精采的论述。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他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青年团的任务》这篇著名演说里，尖锐地指出：学习共产主义如果只限于了解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即使读得滚瓜烂熟，那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列宁辛辣地嘲笑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无产阶级文化的种种胡说。列宁说：“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功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怜的。……要是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如果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知道其他任何事物，那他就根本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引述这些人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时候，在我们记忆的屏幕上，都会无法遏制地映现出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以贬损知识为重要特点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神圣”之极、荒唐透顶的三千八百个日日夜夜。自封为马列“顶峰”、开创了人类文化“新纪元”的“文化大革命”，堂皇、野蛮、无耻、肆无忌惮地践踏蹂躏人类文明，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它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向了全面崩溃的边缘，这可以看得见，可以用数字统计；它对我国人民在精神、文化、道德、心理等方面的扭曲、摧残，则无法估量，很可能要经过一个历史阶段，才会认识得比较清楚。

我们高兴地看到以反思、重建、超越为特点的“文化热”的出现。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上的“文化热”，缺乏应有的历史高度和理论深度，甚至还缺乏必要的知识风貌和文化素质。如果不能迅速治疗长期形成的文化知识的营养

不良症，思维视野的狭窄单一症和理论、哲学的贫血症，我们将不可能对五千年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将不可能对十年浩劫作出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心理的科学的分析，将不可能写出饱满和鲜明的当代意识的史诗性作品，那样，我们将愧对祖先，愧对后人，愧对世界。

时代文艺出版社地处一隅，编辑、出版面向高层次读者的丛书，困难和局限不言而喻。但是，意识到的历史使命强烈地驱遣着我们，即使是在最微不足道的岗位上，也应竭尽绵薄之力，自觉地肩负起通向未来的闸门。

恩格斯曾经建议德国人“最好是首先了解一下国外所获得的成就”，编选那些“对德国尚属新鲜的具有宝贵内容的著作”，因为“只有他们知道了在他们之前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后，他们才能表明他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有着“拿来主义”的明确主张和光辉实践的鲁迅，也说过：“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根据这些原则，从当前文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拿来参考丛书》准备着重编选、出版三十多年来国内读者难以看到，而对中国读者来说“尚属新鲜的具有宝贵内容”的世界名著。既有文学作品，也有哲学、美学、艺术、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等方面的论著；既有古代的，也有近现代的，以至当代的；既有西方的，也有东方的，以至我国的。凡属难以看到的世界文化名著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都在“拿来”之列。

这套丛书准备收进一部分台港以及一些国家的华人作家、学者有参考价值的著作。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同台港和国外华人世界几十年来缺乏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不管从哪方面讲，相互了解十分必要。同一种文化的几个分支，经过几十年的隔离之后重逢，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参照作用。

既然是“拿来参考”，收进丛书的就不会是大家都赞成的同一种观点。这里，会有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以至封建阶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和理论。对待它们，既不能盲目排斥，简单否定，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生吞活剥。我们相信广大读者都会努力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都会具有锐利的眼光，清醒的头脑，坚强的肠胃，来认识辨别它们，分析批判它们，消化吸收它们。

在对待人类创造的知识 and 文明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气魄、广阔胸襟、惊人毅力、科学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光辉典范。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黑格尔辩证法十分流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后来，当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把黑格尔当成一条“死狗”的时候，马克思则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对黑格尔怀着真诚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研读、批判、吸收文化名著，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恩格斯不赞成费尔巴哈在突破黑格尔体系之后，干脆把它抛在一旁的简单化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因为“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重新探讨、批判、检验人类所建树的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才“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列宁：《青年团的任务》）。

在我国现代史上，文化巨人鲁迅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解决了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问题。他有着深厚

的中国文化的根柢，又具有强烈的、多方位的开放意识。鲁迅翻译、介绍了十四个国家九十多个作家的两百多种作品，出了三十三个单行本，加在一起有二百五十多万字，约占鲁迅全部文字的一半。鲁迅著作、书简、日记中，涉及的作家共有二十五个国家、民族的二百五十三个。鲁迅用极通俗、极形象的比喻，以自己的切身体验，说服、批评、告诫那些害怕引进西方文化的庸人：“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象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要是如此胆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识阶级了，……而衰弱的知识阶级是必定要灭亡的。从前或许有，将来一定不能存在的。”

（《关于知识阶级》）出于对自己、对民族、对未来的充分自信，鲁迅对人类文明高度尊重，对外国文化不倦占有，挑选，吸收，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这种牢牢立足中国、大胆面向世界、科学批判借鉴的拿来主义，是鲁迅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巨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这套丛书自筹备、编选、出版开始，便得到了许多作家、学者、领导、文学青年、新华书店和有关印刷厂的广泛支持和热情鼓励。利用这个机会，笔者代表时代文艺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当代著名作家、文化部长王蒙同志来信表示了充分的支持。当代大作家大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德高望重的钱钟书先生，同他的夫人、当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杨绛先生，联名来信说：“这套丛书计划很有意思，只要切实实行，对读者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预祝成功。”捧读国内外学人敬仰的两位老前辈的话重心长的亲切教诲，笔者心情至今无法平静下来。各个方面的支持、鼓励、期望，促使我们进一步地、具体地掂量了这套丛书的分量。同我们的学识、能力相比，我们实在是挑起了一副过于沉重的担子。但是，这项文化工程既然已经开始，就要切实建设下

去。我们一定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竭尽一切力量，努力不辜负广大作家、专家和读者的殷切期待。这套丛书肯定会有缺点、错误，更希望随时得到严格的教正。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于厦门万石岩下旅次



《京 华 烟 云》序

金 钟 鸣

把这部长篇小说呈献给国内读者，我们觉得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林语堂博士(1895——1976，福建龙溪人)的《京华烟云》，是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的长篇巨著。一九三九年出版后的十年间，仅在美国便销售二十五万部。也许是因为《京华烟云》是林语堂旅居美国后用英语写、并在美国出版的缘故，这部五十年来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品，我国读者却十分陌生。林语堂这位曾经活跃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学者，在解放后出版的几十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里，都因为他曾经提倡被鲁迅认为应该缓行的“费厄泼赖”精神，因为他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幽默”、“性灵”的小品文，而被冠以“帮闲文人”或“反动文人”，寥寥几笔，加以否定。至于他一九三六年赴美以后的文学活动，一概未曾提及。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辞海》、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新版《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沿用了这种评价。

怎样全面地、科学地评价林语堂及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待学者、专家进行。为了便于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我们把林语堂这部最重要的作品

付梓出版。

歌德说过：“诗是人类共同财产。……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歌德谈话录》）他还说过：“问题并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要学会互相宽容。”（《评英国刊物〈爱丁堡评论〉》）歌德论述的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林语堂同我们一样，同属炎黄子孙，所不同的是，他一九三六年旅居美国，而一九六六年又定居中国台湾，一九七六年病逝于香港。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样的文学创作，即使是象《京华烟云》这样的用英语写成、着重向西方介绍中国社会的作品，都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海外华人文学，都是同一种中国文化在不同条件下形成的大小不等的几个分支。歌德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尚且具有那种全球意识和博大胸襟，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几个分支，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对于象《京华烟云》这样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作品，就更不应该加以漠视。事实上，把中国现代文学局限于大陆，并把它们置于自足封闭的状态之中加以研究，既妨碍了文学研究上的突破，更不利于文学创作的走向世界。

关于《京华烟云》，西方评论界有过许多很高的评价。不管这些评价是否正确，作一些了解还是必要的。我们出版《京华烟云》，当然不是为了希望读者都去重复那些赞语。我们相信，广大作家、专家、读者，都会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各种角度、各个层面去作出自己的历史的、文化的、美学的分析。只有中国人，才能对这部巨著所描绘的生活、人物、心理、文化，领会得更准确，更深入，并作出切中肯綮、恰如其分的评

价。

泰纳在其文学评论名著《巴尔扎克论》里，认为“对于事物有总体观是高级才智的标志”，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个供玩乐的艺人”，而巴尔扎克笔下的“每一个人都挟带着他一生积累起来的巨量思考，而这些相反而又相连的思考，用它们的统一和矛盾，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百科全书”。驾驭从义和团运动到七七抗战这四十年中国的历史风云，展现纷纭繁细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国近现代社会面貌，勾勒数以百计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不同灵魂，在平淡自然之中鞭撻丑恶，揭示美的毁灭和毁灭的美，林语堂显然是有着自己的“总体观”，显然是熔铸了自己的全部人生体验，显然是处处渗透着自己信奉的哲学。作为庄子的私淑弟子，林语堂明确宣布以庄子哲学来认识历史，观察社会，体验人生，这就使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梦幻的、命定的色彩，也造成了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的意念化。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早就接受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科学的洗礼，从其所处的地位上尽可能真实地描绘生活，这就在作品中产生了庄子哲学同社会现实、神圣历史同世俗历史、观念历史同人类历史的深刻冲突。这部作品，处处流露着把庄子哲学现代化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特点、弱点和偏见，又处处渗透着民主、改革、爱国的愿望。总的来说，《京华烟云》并没有因为标榜庄子，而把中国近现代写成“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地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历史（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柯夫》里对蒲鲁东的批评），而是封建皇朝、官僚政治、吃人礼教腐朽没落，民主要求不断高涨、民族意识迅速觉醒的历史。如果说，庄子哲学的化身姚思安凭静坐沉思，获得自我，成为“真人”，那末，作者最钟爱的人物、“道家的女儿”姚木兰，则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越来越背离了庄子的哲学，在群众抗日的洪流里，实现着做

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愿望。至于对日本侵略者在军事、经济两个方面残暴、血腥罪行的无情而独特的揭露，对年青一代毅然决然抗日、进步的赞美，更是当时远在异国它乡的林语堂先生爱国热忱的真诚流露。虽然由于种种局限，作者不大理解朝气蓬勃、代表未来的年青一代，更不理解近现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在艺术上描绘得也不够，甚至有消极、抵触之处，但小说中的有为青年不再接受庄子的生死、盛衰听其自然的消极思想，不再一味幽默，不再“费厄泼赖”，这正是林语堂先生在民族危亡关头的一种可贵的进步。

本书附林语堂先生的女公子林如斯的《关于〈京华烟云〉》一文，供阅读和研究参考。一九四一年，国内曾连续出版过郑陀、应元杰合译的中文版本，越裔的节述本，本书采用张振玉教授一九七七年的译本。个别文字作了修订。在此，谨向林女士和张教授表示感谢。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于厦门万石岩下旅次

关于《京华烟云》

林如斯

我站在这个地位很难写书评，女儿批评父亲的书，似乎从来未听说过。那又何必写呢？因为好多话藏在肚子里非说不可。可不要说我替父亲吹牛，也不用骂我何以如此胆大，因为我要用极客观的态度来批评，虽然情感也不可无。我知道父亲每晨著作总是起来走走吃吃水果，当她写完红玉之死，父亲取出手帕擦擦眼泪而笑道：“古今至文皆血泪所写成”，今流泪，必至文也。”有情感又何妨。

《京华烟云》是一部好几篇小说联成的长篇小说，但不因此而成一部分散漫无结构的故事，而反为大规模的长篇。其中有佳话，有哲学，有历史演义，有风俗变迁，有深谈，有闲话，加入剧中人物之喜怒哀乐，包括过渡时代的中国，成为现代的中国的一本伟大小说。

《京华烟云》在实际上的贡献，是介绍中国社会于西洋人。几十本关系中国的书，不如一本道地中国书来得有效。关于中国的书犹如从门外伸头探入中国社会，而描写中国的书却犹如请你进去，登堂入室，随你东西散步，领赏景致，叫你同中国人一起过日子，一起欢快，愤怒。此书介绍中国社会，可算是非常成功，宣传力量很大。此种宣传是间接的。书中所包含的实事，是无人敢否认的。

然此小说实际上的贡献是消极的，而文学上的贡献却是积极的。此书的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的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你一翻

开来，起初觉得如奔涛，然后觉得幽妙，流动，其次觉得悲哀，最后觉得雷雨前之暗淡风云，到收场雷声霹雳，伟大壮丽，倏然而止。留给读者细嚼余味，忽恍然大悟；何为人生，何为梦也。而我乃称叹叫绝也！未知他人读毕有此感觉否？故此书非小说而已！或可说，“浮生若梦”是此书之主旨。小说给人以一场大梦的印象时，即成为伟大的小说，直可代表人生，非仅指在二十世纪初叶在北京居住的某两家的生活。包括无涯的人生，就是伟大的小说。

全书受庄子的影响。或可说庄子犹如上帝，出三句题目教林语堂去做，今见林语堂这样发挥尽致，庄子不好意思不赏他一枚仙桃吧！此书的第三部题为“秋之歌”（即第三个题目），取庄周“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生死循环之道为宗旨：秋天树叶衰落之时，春已开始，起伏循环，天道也。故第三卷描写战争，可谓即描写旧中国的衰老，就是新中国的萌芽。故书中有“晚秋落叶声中，可听出新春的调子，及将来夏季的强壮曲拍”等语。

又有一段论人之永生与宝石之永生，我认为非常重要。可说人之永生是种族的，而宝石的永生是单独的。木兰游秦始皇无字碑那一段尤说得详尽。那一块石头无情无感，故永远生存，人为有情之动物，故个人死去而家族永远流传。有人说这不过为要充满人求永生之欲望，强为解释，但我说有深道理在内，非妄言也。

木兰的生活变迁，也很值得研究：从富家生长享用一切物质的安适，后变为村妇，过幽雅山居的生活，及最后变为普通农民，成为忍苦，勇敢，伟大的民众大海中的一滴水。父亲曾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可见木兰是父亲的理想女子。

书中人物差不多可以代表中国社会各种人物。此书内可以看见旧派人物慢慢的消减，新式的人物跟着出来。代表最旧的是牛

夫妇，曾老爷，代表新的是环儿，陈三，黛玉。祝你们胜利！

这部小说虽然是用英文写成，却有许多奥妙处，非中国人看不出来。西洋人看书比较粗心，也许不会体悟出来。中国奇特的心里，非中国人不能了解。又如书中谈《红楼梦》之处，当然非未读《红楼梦》者所能欣赏的。也有几处讽刺某一派人，也得中国人才能领会。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父亲突然想起翻译《红楼梦》，后来再三思虑而感此非其时也，且《红楼梦》与现代中国距离太远，所以决定写一部小说。最初两个月的预备全是在脑中的，后来开始打算，把表格画得整整齐齐的，把每个人的年龄都写了出来。几样重要事件也记下来。自八月到巴黎时动笔，到一九三九年八月搁笔。其中搬迁不算，每晨总在案上著作，有时八页，有时两页，有时十五页，而最后一天共写了十九页，成空前之纪录。其中好多佳话或奇遇，都是涉笔生趣，临文时杜撰出来的。

父亲不但在红玉之死后挥泪而已，写到那最壮丽的最后一页时，眼眶又充满了眼泪，这次非为个人悲伤而掉泪，却是被这伟大的民众所感动，眼泪再收也收不住了。作者写得自己哭了，怎么会叫读者忍着眼泪咽下去呢？

《京华烟云》是一本可以随时翻看的小说，并不是一定要有闲时才看。最好是夜阑人静时独自个儿看；困倦时，起来喝口清茶自问道：“人生人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小丑否？”